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第一卷

(1921—1949)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贵阳

责任编辑:谢丹华 杨雅云
封面设计:唐锡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06
ISBN 978 - 7 - 221 - 07381 - 5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贵州省—史料 IV. D23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001 号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6828612 邮编:550004
印 刷: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850×1 168 毫米 32 开 14.25 印张 31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001—8000 册
ISBN 978 - 7 - 221 - 07381 - 5/D235.73
定价:58.00 元

顾问 钱运录 栗战书 赵克志 石宗源
林树森 石秀诗 孙 淦 王富玉
张群山 徐运北 张玉环 苗春亭
王朝文 龙志毅 何仁仲 梁明德

王秉鋆

主编 吴廷述

副主编 瞿晓红 杨建光



龙大道烈士（1901—1931）



林青烈士（1911—1935）



“五四”运动期间，贵阳爱国青年学生在南明河畔焚烧日货。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榕江县城）



中共黔桂边委驻地（望谟板陈）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 在贵州的革命活动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早期组织与活动	(39)
第一节 中共赤合特支的建立及斗争	(39)
一、中共赤水组织的建立	(40)
二、赤合特支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41)
第二节 中共黔桂边委的成立及活动	(48)
一、红七军余部在黔桂边的活动及中共黔桂边委的建立	(49)
二、中共蚕瓦支部的建立	(51)
三、中共卡法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52)
四、中共丰业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54)
五、中共荔波、翁昂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55)
第三节 中共毕节支部的建立与“草原艺术研究社”	(57)
一、中共毕节支部的建立	(57)
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	(60)
第三章 红军在贵州的活动	(64)
第一节 红七军、红八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	(65)
一、红七军在黔南、黔东南开展的革命活动	(65)
二、红八军在黔西南开展的革命活动	(72)
第二节 红三军在贵州的活动	(79)
一、红三军进入黔东	(80)
二、枫香溪会议	(82)
三、红三军改造黔东“神兵”	(84)

第三节 红六军团西征过贵州	(88)
一、红六军团进军贵州	(88)
二、红三军与红六军团的会师	(91)
第四节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和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94)
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97)
二、占领遵义、进击桐梓	(101)
三、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102)
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	(107)
五、黔北、遵义、赤水河游击队	(114)
第五节 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的活动	(122)
一、红二、红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22)
二、红二、红六军团重返贵州	(123)
三、乌蒙山回旋战	(126)
四、盘县会议及奉命北上	(129)
第六节 贵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31)
一、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	(135)
二、黔东革命根据地	(138)
三、黔北革命根据地	(142)
四、黔西北革命根据地	(146)
第七节 贵州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	(150)
一、贵州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	(150)
二、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人民的斗争	(157)
第八章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及党组织的发展	(163)
第一节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164)

荔波等地坚持斗争,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和发动群众。1935年5月,中共广西东兰县委员会在中共广西思果中心县委员会的协助下,将中共东兰县委改建为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员会,黄举平任书记。东兰中心县委的领导范围是:东兰、凤山、万冈、凌云、乐业、河池、南丹、天峨、都安及贵州省的荔波、贞丰、罗甸等县。是年,由当时在荔波县活动的东兰籍党员组建了中共荔波支部,即荔11支,韦汉超为支部书记,隶属中共东兰中心县委。1936年9月,中共翁昂支部建立,谭耀机任书记,隶属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党支部建立后,韦汉超又集中原3营的部分骨干和荔波地方的骨干,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斗争和统战活动,其范围延伸至荔波县全境及独山、榕江、南丹、思恩、宜北(今环江)等地,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征兵拉夫、征粮负担,印发了《敬告群众书》、《反对军阀抽丁传单》、《告民团特种队、后备队、预备队的兄弟书》、《右江上游各县代表大会决议》、《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通告》(第一号)等等,号召人民觉醒起来;宣传边区革委在各地组织的抗日同盟会,动员人们参加这一组织,以及动员应征青年入伍,赴前线打日本鬼子,讲明共产党的抗日和征兵主张,如实行独子不征,可交免役金代替,双子抽签入伍,凡到前线抗日的战士,家属可免派工、派夫,并免除地方额外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减轻群众负担等。

然而,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这一地区的斗争环境不断恶化,韦汉超从荔波去思恩开展革命工作时,被国民党杀害;谭国联在南丹县大平屯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韦仕英等同志被迫隐蔽农村开展地下活动。

第三节 中共毕节支部的建立 与“草原艺术研究社”

一、中共毕节支部的建立

毕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与四川、云南两省相邻,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土地贫瘠,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为反抗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同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受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毕节地区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为寻求革命真理,走出家门,外出求学,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组织,为推翻反动统治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导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席卷贵阳,广大青年学生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此时在贵阳高中读书的毕节青年学生秦天真,追求进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了“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主席,组织、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秦天真毕业后回到家乡毕节,利用在毕节中学任教的

有利条件,组织当地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联系了一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民众运动的中坚力量。同年冬天,早年出省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林青等回到毕节,立即投入抗日反蒋活动,并为建立贵州地下党的组织进行一系列准备。

林青,原名李远芳,又名李肃(旭)如,曾化名矛戈、刘应生,1911年出生在毕节县(今毕节市)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因家境贫寒,13岁到县城一家商号当学徒,1926年到重庆读书学艺,参加了一个演出进步戏剧的话剧团,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3月31日,因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暴行的群众大会而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此后林青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并于1929年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林青来到上海。次年夏考进上海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并接上了团的组织关系,被安排在沪东团区委工作,积极参加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一系列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林青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之中,他与在上海的同乡缪正元(1927年在武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转移到上海活动,在沪西区团委工作)等一起组织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成立了“朝阳音乐社”,通过“左联”的关系,在上海沪东和沪西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以文艺为武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林青、缪正元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林青的活动引起英租界巡捕房的注意,被以“共产党嫌疑”而拘捕入狱,判刑两年。次年,林青出狱后,由于组织被破坏,接不上组织关系,便与同样失去组织关系的缪正元回老家毕

节,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秋冬之交,林青和缪正元一起回到毕节,立即与已在毕节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秦天真取得联系,共同讨论和研究了如何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抵制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的办法和措施。根据毕节的实际情况,决定从文艺宣传入手,首先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对象,然后把开展活动的人员扩大到社会进步青年以至广大群众。

为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把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通过绘画、演剧、歌咏等形式,联络了一批抗日反蒋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徐健生、邱在先、熊蕴竹、宁起鲲、王树艺、孙师武等,并以这批人为基础,在毕节成立了以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培养青年骨干、团结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为目的,以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为活动方式的“草原艺术研究社”。“草原艺术研究社”成立的消息一传开,便得到积极响应,参加人员除了毕节中学学生和进步教师外,还有社会上思想进步的青年以及小学教师。

为更好地指导“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领导今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把建立党组织作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发展秦天真入党后,三人在毕节建立了中共毕节支部,林青任书记。党支部确定了四条行动纲领: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四、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在中共毕节支部的直接领导下,以“草原艺术研究社”为依托,毕节的歌咏、话剧、美术、读书等活动十分活跃,成为传

播马列主义、团结广大青年、培养青年骨干、开展抗日反蒋宣传的阵地。

中共毕节支部在领导“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活动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组建革命武装的活动，掌握了范建章领导的游击队，为以后革命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

“草原艺术研究社”成立后，还相继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等群众组织，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人数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其次是社会各界人士，就连当时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青年也有20多人。到1934年春节前后，参加“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的人员达200人左右。

“草原艺术研究社”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在其创办之初，暂时设在轿子街女子二小（今毕节市松山路二小）内。研究社的成员分成4个小组：文学组、戏剧组、绘画组、歌咏组，在二小及一些成员家里聚会，阅读和研究进步书刊，写文章、编剧本、排演戏剧、演唱歌曲、书写抗日标语、画抗日漫画等。多才多艺且很有组织文化艺术活动经验的林青特别对文艺活动要表现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强调：“歌咏不唱低沉庸俗的靡靡之音，演戏要演反对压迫、歌颂光明、鼓舞人们进步的戏；绘画要画出中华民族的气魄，表现刚强坚毅的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反映人民的觉醒和民族的抗争。”^①以此作为“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宗旨并得到大

^① 秦天真《风雨八十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40~41页。

众的拥护和坚持。不到一个月，研究社成员就教唱了数十首进步歌曲，排练了十几出话剧，并书写了许多抗日反蒋的大幅美术标语张贴在毕节山城的大街小巷。在此浓烈的宣传气氛中，一时间从城镇到农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整个毕节山城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1934年2月，正值春节期间，“草原艺术研究社”在毕节县川祖庙进行了一次连续两天的大规模的公演活动。每次演出开幕之后，首先由缪正元指挥歌咏队合唱《国际歌》，接着演唱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共同谱写的《草原之歌》：“草原青年，草原青年，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光明在前，光明在前，向前进！向前进！”此外还演唱了《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囚徒歌》、《大路歌》以及岳飞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满江红》。演唱结束之后，话剧组又排演了由林青导演的进步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及《最后一吻》、《火的跳舞》等几个意义深刻、富有感染力的短小话剧。这些演出，形式新颖，内容进步，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矛盾和斗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社会的好评。

“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歌声和演出，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但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注意和恐慌。由于当局的威胁和阻挠，使得原拟在第三天的公演被迫停止。公开活动虽然被禁止了，但“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成员们并没有灰心丧气，相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更加积极，但为了防止意外，“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成员们的活动方式也由集体转入分散，由公开转入隐蔽，其社址也由原轿子街女子二小改在南门林青家里。在中共毕节支部的领导下，“草原艺术研究

社”还与毕节中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发动了两次旨在抗议反动当局的学潮。毕节中学是当时毕节山城最有影响的学校,该校的学监在课堂上传播、渲染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攻击和漫骂共产党,禁止学生正当的社会活动,反对招收女生,引起不少青年学生的不满和愤怒,对其言行进行了反驳。中共毕节支部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在毕节中学发动学潮,由秦天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具体组织领导这次活动。在党组织和一部分青年教师的号召下,由进步青年学生王树艺、高大光、瓦兆竹等率领同学们发起了抗议活动,最后终于将这名反动学监赶出校门,斗争取得了胜利。时隔不久,发生了当地驻军军官调戏女学生的事件。肇事军官不仅公开调戏、猥亵一名女学生,还打死前去问责的一名青年,气焰十分嚣张。当局畏惧军队权势,不但不惩办凶手、主持正义,反而诬陷女学生作风不正,并将其开除出学校,致使她饱受屈辱被迫吞鸦片自杀而死。

惨案发生后,引起了毕节各界人民对国民党军队的无比愤怒,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制造这一悲惨事件的凶手。中共毕节支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林青、秦天真带动下,“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广大成员和各校学生,开展了罢课斗争,并且上街举行抗议示威,以快邮代电和张贴标语等形式,揭露反动统治当局和军阀的丑恶行径,并组织抬棺游行。林青用一块绿布写了“为封建压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厉鬼”几个字挂在棺木上,向反动势力抗争示威。中共毕节支部一面组织社会力量声援学生的行动,一面又与统治当局进行交涉。但是反动当局变本加厉地镇压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组织,他们对中共毕节支部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极端仇视,妄图以镇压手段来平息民怨,并趁机打击进步力量,破坏

抗日救亡运动,扬言要搜查和逮捕进步人士。

6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革命力量,“草原艺术研究社”的主要骨干在中共毕节支部的组织下,有计划地进行转移。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和几个“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分散转移到贵阳、安顺等地开展活动。

中共毕节支部及其领导下的“草原艺术研究社”在毕节开展的革命活动,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有力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和对光明前景的向往,培养发展了进步力量,锻炼了党的骨干,为中共贵州地方组织的更大发展和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组织在贵州早期的革命活动,对长期处在深重灾难重压下渴望翻身求解放的贵州各族人民来说,不啻于黑暗中的一丝亮光,使他们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对革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党组织在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革命力量和斗争经验,为党组织和红军进一步在贵州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狱,对原各级苏维埃政府、游击队的成员和进步群众大肆搜查逮捕。特别是对留下的红军、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的骨干,采取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进行残害。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彭新民被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大定抗日救国团团长叶刚,红军走后,惨遭杀害。尽管敌人如此凶残,但黔西北根据地的各族人民没有被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所压倒,黔西北根据地各族人民在艰难困苦中以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军阀进行不懈斗争。

第四章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及党组织的发展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贵州从20年代末期,开始有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活动。1929年,四川党组织在贵州赤水建立中共赤(水)合(江)特支;1930年,在湖北入党的党员肖次瞻回原籍贵州思南县开展革命活动,在四川成都入党的周守如也回到遵义开展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继展开。广西党组织在黔桂边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和中共罗甸县蛮瓦支部;四川籍中共党员邓止戈来到黔北,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林青、缪正元回到原籍毕节,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毕节支部。1930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三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开展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的组织。贵州早期党组织的活动,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斗争,推动了马列主义在贵州的进一步传播,为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州,在贵阳、遵义、毕节等地的师生和教师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学生纷纷罢课示威,上街演讲、游行,抵制日货,惩治奸商,宣传抗日救国。

1935年1月,省工委的建立,使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935年5月,省工委在贵阳地区组织“五四”16周年,五卅11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张贴传单、演剧、歌咏、办刊物等方式,宣传“五四”、五卅的反帝传统。同时,贵阳、遵义、独山、都匀、惠水、贵定、瓮安、凯里等地出现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开展革命斗争及中共贵州早期组织的活动,广泛传播了革命思想,党在贵州省的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毕节支部从毕节转移出来后,1934年7月林青、秦天真、缪正元等人先后在安顺、贵阳等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徐健生、李策、孟昭仁、李光庭、喻雷、夏之刚、蓝运臧等入党。随后在贵阳一中、贵阳高级中学、男师、女师、达德等学校开展建党工作,相继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陆续建立了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群众组织,引导阅读进步书刊和通俗马列主义著作,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及抗日救亡的主张。

由于党的活动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摆脱了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展,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纷纷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躲避四川军阀刘湘追捕来到贵州的邓止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上海回贵州活动的刘茂隆加入了党的行列;一直留在南明高中的进步青年徐健生、李策、孟昭仁等,团结了不少爱国学生,投入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短短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

义、炉山(今凯里)等地以及贵州军阀的部队里,都有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活动。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和汇合,在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之前,为了积极开展贵州的革命活动,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商议,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9人于1934年9月组成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党员为核心、有党内外人士结合的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指导全省的革命活动。“九人工委”的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养进步青年,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邓止戈、黄大陆等负责兵运工作,林青等到外地寻找上级党组织,秦天真留在贵阳负责联络和组织学运、读书会等群众团体工作。在“九人工委”成立之前,邓止戈与林青发展黄大陆入党。由于黄大陆当时在黔军中任少将参谋长,为有利于开展地下工作,他未参加“九人工委”。黄大陆在黔军第一师中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团结了一批军人,并有意识地把这些人安排在军队的重要部门工作。

1934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活动的发展,贵阳的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党的各种外围组织,并逐步发展党员。到1934年底,党的组织得到不断发展,有党员40余人,为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林青赶赴遵义,经过寻访,见到了早年同被关押在上海监狱的战友吴亮平。吴亮平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经过吴亮平的介绍,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罗迈代表中共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1935年1

月中旬,林青返司贵阳传达中央决定时,因邓止戈当时在外未能参加,秦天真、刘茂隆等听取了林青的传达。鉴于贵州干部缺乏,省工委决定刘茂隆参加省工委为委员,省工委负责将此决定向中央汇报。当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林青赶赴遵义,途中被阻,未能向中央报告,而刘茂隆一直作为省工委委员进行工作。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来的杨涛(潘汉年)到达贵阳,与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上头,听取了贵州工作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二、窃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三、掩护杨涛去上海以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关系。下达任务的核心是要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呼应,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了工作。林青及时向缪正元布置窃取敌人密电码的任务。

缪利用在国民党军队电台工作之便,迅速偷抄,完成了任务。缪还按林青指示,随时做好准备,待与红军接近时,寻机带电台投奔红军。当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期间,秦天真通过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设法窃取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和密电码本。省工委还遵照中央指示,派地下党员蓝运臧(女)护送杨涛经广西、香港安全抵达上海,完成了护送中央代表的任务。中央代表留下与红军联络的暗号,在后来地下党组织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省工委还利用各种机会牵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支援红军。中央红军从遵义挥师北上时,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黄大陆

利用军阀各自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拼杀的心理,以参谋长身份劝说黔军何知重部以“兵无宿粮”为由,避开与红军作战。当红军一渡赤水时,何知重按兵于桐梓,未参加土城战役。红军二渡赤水前,王家烈电令何知重部在二郎滩等处防堵,作战命令落入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缪正元之手,缪及时通过杨逸民(地下党员、缪身边的电台文书)转告黄大陆,黄又设法使何知重将部队停滞于习水、土城一带,从而减轻了红军的阻力,为配合中央红军转战黔北,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 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此外,在省内的一些县、乡建立了党的支部或有党员进行活动。为了抓好武装斗争,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建立了军事领导小组,活动于贵州的安顺、黔东南一带,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在艰苦的岁月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中共安顺县支部、中共安顺县工委的建立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后,王家烈政权垮台,贵州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为了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斗争,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组织发展,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1935年2月,省工委派秦天真去安顺传达林青在遵义向中央汇报和联系的情况,安顺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在